

关于“中国台湾与非洲的关系”的思考

龙向阳

【内容提要】“中国台湾与非洲的关系”这个命题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台湾历史的定位问题，特别是关于台湾历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关系问题；二是“台湾与非洲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两者的缘起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大视野中，台湾历史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台湾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也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国历史是两者的共同历史依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关系缘起于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对外关系之历史，台湾与非洲的关系则与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民外交有着天然的历史连接。由此，台湾与非洲的关系便带着中华民国外交历史的先天缺陷，即依附性和脆弱性。

【关键词】台湾历史的定位；台湾与非洲关系；中华民族历史的辩证法

【作者简介】龙向阳，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州，510631）

当我们提出“中国台湾与非洲的关系”这个命题时，其内在的学术逻辑就必然延伸出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一是台湾历史的定位问题，特别是关于台湾历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关系问题；二是“台湾与非洲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两者的缘起问题；三是“台湾与非洲关系”的内涵问题，特别是分析

“台湾与非洲关系”的方法论问题。在演绎层次上，这三个问题构成一个简单的决定论链条或因果递进关系，即台湾历史问题决定了“台湾与非洲关系”的缘起问题，而台湾与非洲关系的缘起问题又决定了台湾与非洲关系的内涵问题。而且，在这个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演绎推进过程中，台湾历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台湾与非洲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关系”这两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力量又催生了“台湾与非洲关系”内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自然就增添了关于“中国台湾与非洲关系”这个命题研究的挑战性。由于第三个问题涉及文献回顾与学术反思，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笔者拟将单独另文进行论述。所以，本文仅就前两个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关于台湾历史的定位问题^①

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将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作为世界现当代史的分水岭。但是，国家作为特有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在宏大叙事方面，它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微观的体验上，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特殊性。所以，单一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分界点并不必然在所有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与世界历史保持一致。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以来，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由于其内在的扩张性而将以往孤立的世界转变成为一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统一的世界，在这个不断演进的统一过程中，非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发生和经历了许多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发生过的国家建构与重生的劫难。资本主义这个全球化的因素导致非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和宣传的主权、独立、统一、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彻底绝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悖论。对于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历史发展的滞后性更加明显。后发展中国家现当代历史进程与世界现当代历史进程的这种交错性，也更加反映了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特别是后发展中

^① 这里所谈的是台湾地区的历史定位问题，而有关台湾地区现实的政治定位问题请参阅李义虎《台湾定位问题：重要性及解决思路》，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37—144页。

国家在民族和国家建构中发生的战争与冲突，以及反复的分离聚合现象就是例证。应该说，这种现象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扩张的特有产物。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国家建构也一直处于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之中，国家的分离聚合现象也特别频繁。但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因素相比，早期国家建构的自主性更强，内生因素更重要，国家分裂的程度和层次不深也不持久。资本主义因素的这种历史意义是祸是福，尚难评说，一切尽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体验之中。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及后发展中国家，其历史的古代、近现代与当代进程脱离不了这个运动规律和大趋势的制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最好写照。而在中华民族的聚合分离历史上，台湾历史却具有这个历史发展特征的最明显的注释和体现。从公元一千七百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开始，台湾逐渐进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视野之中，从最初的移民开发到后来的地方治理，台湾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台湾与大陆主体经历了七次离合，即1624—1661年被荷兰殖民统治的分离，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台湾与大清帝国的分离，1684年大清帝国收复台湾的回归，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瓜分台湾的分离，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国收复台湾的回归，1949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在这七次离合中：有四次分离，其中被外力掠夺的分离有两次，受内部因素影响而分离的有两次；有三次回归，其中从外部统一的有两次，从内部统一的有一次。在这里，我们同样要正确认识到内部分离与外在力量殖民或掠夺的分离、内部自我统一与从外部力量统治中收复主权的统一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是我们认识台湾历史的根本立场。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①，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台湾一直处于中华民族历史之中。首先，从过往的历史来看，无论台湾经历何种分离，其最终都回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这个大趋势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其次，从现实来看，虽然台湾与大陆因为国共内战而隔离，但两岸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同一的，虽然两岸在政治上存在对立和竞争，但恰恰是这种对中华民族归属的竞争而使两岸不可分离，在竞争中保持一致，在对抗中走向统一。其中，“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就是基础和保障。中国共产

① 本文所引用的“大历史观”就是黄仁宇先生所使用的“大历史”观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① 而且在1949年以后的三四十年间,台湾当局虽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合法地位,但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这说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岸的中国人在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问题上具有共识^②。虽然当下台湾地区出现一股“台独”的力量,但无论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还是主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其执政的法理根基仍然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关于台湾与大陆的离与合,黄仁宇先生有精辟的评价。他说“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分合,是中国大历史未来发展的最大课题。但人类的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被某个人的意愿所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断崛起和强大是现当代国际社会中的最大变化和事实,有依赖于此,中华民族的扭曲历史正在不断纠正,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正在迈向光明前景。

所以,依据上面的阐述,本文认为,台湾历史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台湾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也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当下中华民族历史的主体,当代台湾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分支,它们之间相互对立但又统一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整体之中。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辩证法。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从法理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继承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合法性和原则理念已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④;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华民族历史一直以来由大陆地区所主导和所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②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外事人员读本》,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

③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1页。

④ 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获得172个国家的承认,而台湾当局只有22个国家的非法承认。

代表。台湾历史的这种定位既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统一的中华民族历史的一般属性，又反映了台湾与大陆分离状态下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①。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台湾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又凸显了台湾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首先，在国家建构方面，台湾历史提供了许多直接的经验。例如，台湾从早期的驻军，到低级行政机构的设立，再到独立建省，以及成为东亚“四小龙”之一的变化，使其在地区治理、经济发展和行政区划的设计等方面为中华民族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17世纪以来，台湾成为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进行抗争和交涉的重要区域，这对中华民族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样，自17世纪以来，台湾与大陆的分分合合使中华民族之中国在国家建构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是来自外来力量和因素（包括文化、宗教、制度等）的影响，二是来自台湾地区在变动中产生的社会、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内部转型问题。另外，在国际关系方面，自17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台湾一直被深深地嵌入到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重大变迁之中，其与大陆的分分合合就是中华民族在东亚地区国际地位变化的直接反映。

二 关于“台湾与非洲关系”的缘起问题

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1945—1949年就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国共两党两军的竞争与彼此消长，以及中国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变化，都深刻影响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各种力量和利益的交错特别是冷战的背景因素，最终导致了1949年以来中华民族历史的复合进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分水岭。这一事件也宣告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已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这是在同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由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过程。正因此，在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自退居台湾之后，仍然以“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政府”这种

^① 有关台湾历史的特殊性和一般性问题的论述，请参阅孔立《试论台湾历史的特殊性》，《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2期，第1—10页。

特殊的名义和方式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造成了当下中国国家主权的复杂性，此种状态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纠结。同时，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这种扭曲也反映了现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极端异化。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宣布迁往台北，也由此，作为地理性行政区的台湾逐渐向政治性的行政区发生转变，伴随着这种变化，“台湾与非洲的关系”也就有了所谓的肇始。同时，也就出现了“台湾与非洲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关系”的关系问题，以及两者的缘起问题。

依据上文所阐述的中华民族历史辩证法思想，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台湾与非洲的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关系”从属于“台湾对外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并从属于“当代台湾历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所以它们之间也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它们的对立集中在争夺“一个中国”的合法性和代表性问题上，但它们又统一于“一个中国”的未来历史之中。而对“台湾与非洲的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关系”而言，它们的共同历史既依托于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历史，又统一于“一个中国”的未来历史之中。所以，中华民国历史就成为两者的共同缘起之依据。毕竟，今天的大陆与台湾的隔离是一种内部性的问题，这种内在的对立与外在的统一并不矛盾。这就是大历史的视野。在大历史视野中，整体大于个体，意义大于过程；既讲矛盾，又讲统一，其中矛盾是表现，统一是本质。

事实上，1949年以后中华民族历史分两支的原因早就蕴含在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历史之中了——国共两党的矛盾与竞争。也因为此，在中华民国时期国内存在着两条战线的对外关系，一条是以国民党为执政党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正如著名学者牛军所言“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全局看，1935年至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中共对外关系与两个重大的领域直接相关。首先它是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中共对外关系的研究，对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阐述肯定是不完整的，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演变等等，都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其次是中共对外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有着‘天然联系’，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首先必须理

解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理解中共对外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天然联系’。所谓的‘天然联系’，从历史连接的层面，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从中共的对外关系中演变过来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天然联系’并不仅仅是指‘历史连接’。它的核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动力，直接来自中国革命运动，它在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产生于中国革命运动，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由中国革命运动所形塑的，而且它也是直接从中共的对外关系延续下来的。只有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才能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的来龙去脉。”^① 由此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关系缘起于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世界战略观及对非洲的认识。

上述观念也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继承是一种辩证的继承，是一种“扬弃”，即保留积极的，否定消极的。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华民国的外交是对传统晚清外交的承袭，它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外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继承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创造性。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外交政策和原则中也有直接的体现。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的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我国外交的三个重要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三个方针建构起了中国新型外交的原则框架，为新中国外交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讲话中就“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内涵作了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② 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含义，周恩来的解释是“帝国

① 牛军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再版序言，第4—5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9页。

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①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将此公告正式函告世界各国政府，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这表明了新中国不继承旧中国外交关系的立场，同时也表明了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

上述分析说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及其外交的合法继承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对中华民国外交的部分否定并不矛盾，就如承认1949年以后的台湾当局外交有对中华民国外交的继承性与否定台湾当局是中华民国及其外交的合法继承者的观点一样，都是辩证的思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外交历史遗产所否定的那部分又恰恰被台湾当局继续利用着。这自然使台湾与非洲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本质的天然缺陷，即依附性和脆弱性。具体而言，就是过于依赖西方集团的扶持，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容易受国际局势变动的影响。

三 结语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本文在结尾处引用这么长的恩格斯话语，无非就是想表明一种历史观，那就是历史没有对错，只有因果。而关于历史的因与果之间的认识和理解，蒋介石 1944 年 5 月 31 日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倒是一语中的，发人深省。其写道 “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果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② 所以，面对历史，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

（责任编辑：方 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7 页。

② 黄仁宇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增订本），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 页。

Key words: predatory theory , international war , civil conflict , state building

Dilemma of Governing African Armed Groups: A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 in Uganda

Ling Yan: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which accused Joseph Kony and the other four leaders of 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 of anti-human and war crimes , fell into a series of dilemmas , name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dea and logic of justice , political notion and legal notion , along with the suspicio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rew upon the preconditions and legality of the court's intervention. These dilemmas cast light upon the conflict of the notion and norm of local governance between the west and Africa , the bias and double standard of the court , as well a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Considering the local people underscore reconciliation and security far above justice and punishment , it is very inadequate to resolve the civil conflict in North Uganda and the issue of the Lord's Assistance Army by means of the punishment imposed by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s supposed to value local law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practice , attach importance to participatory solution , strongly support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 Uganda , and strengthen peace building in Africa as well.

Key words: African armed group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global governance

A Reflection on "Taiwan-Africa Relations"

Xiangyang Lo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esis of "Taiwan-African relations" involves two key issues. The first is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aiwan ,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d tha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cond issue is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Afri-

can relations” and “PRC and African relations.” From the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aiwan has been integral to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Likewise, contemporary Taiwan history and PRC history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other things, the history of PRC is the main part of that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le the history of Taiwan a subset. The two histories are mutually contradictory and integrated in the “One-China” principle. So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African relations” and “PRC-African” relations.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are in conflict in that each strive for the legitimacy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One China” while they are integrated in the future of China. Both Taiwan and PRC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history of the then Republic of China (ROC) in the mainland, although “PRC-African relations” originated from foreign affai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whereas “Taiwan-African relations” is the descendant of the diploma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fore, “Taiwan-African relations” inherit the inherent weaknesses of ROC, namely vulnerability and dependency.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aiwan; Taiwan-African relations; the historical dialec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uth African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Emerging Powers

Wei Fang: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emerging powers, the BRICS cooperation mechanism established a ne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emerg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outh Africa as a Lightweight economy can successfully joined the BRICS cooper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s diplomatic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remodel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seizes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rise of emerging powers and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ranks of the emerging powers, which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 through a series of dip-